



四川大学一流学科建设专项经费资助

战国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

ZHANGUO QINGTONGQI NIANDAI
ZONGHE YANJIU

彭裕商 著

巴蜀书社



四川大学一流学科建设专项经费资助

战国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

ZHANGUO QINGTONGQI NIANDAI
ZONGHE YANJIU

彭裕商 著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国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彭裕商著. —成都:巴蜀书社, 2018. 2

ISBN 978-7-5531-0953-4

I. ①战… II. ①彭… III. ①青铜器(考古)-鉴定-研究-中国-战国时代 IV. ①K876. 4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31360 号

战国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

彭裕商 著

责任编辑	徐庆丰
封面设计	张 科
出 版	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市金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照 排	成都完美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40mm×170mm
印 张	23.5
字 数	450 千
书 号	ISBN 978-7-5531-0953-4
定 价	88.00 元(精装)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前言

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与文献不足征的夏商两代相比，周代有许多典籍传世，历代学者对周代各方面情况的传述也比夏商二代为多，这就使得周代历史文化的研究，较之夏商有了很好的条件。东周时期，作者辈出，载籍弥繁，为东周历史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资料。但先秦古籍由于著作体例和作者个人观点等方面的情况所限，不可能全面反映当时历史文化的全貌，因此，当今对周代的研究，必然要愈来愈多地结合到考古资料。

青铜器是古代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数量众多，其本身的发展变化自成体系，且又往往铸有铭文，因而是最为重要的考古资料，现在周代历史文化的研究，两周青铜器材料是不可或缺的^①。

对任何一种考古材料来说，都必然要经过一番认真的整理，才能更好地将其运用于学术研究，年代学研究，就是整理青铜器最基本的工作之一。在这项工作中，西周青铜器的研究相对做得较为充分，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已有许多重要成果发表，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对东周青铜器的研究，特别是年代学的整理，学者做得相对较少，且研究范围多局限于某个区域，至今尚无全面系统的专著问世，这就造成了周代青铜器研究发展不平衡的状况，限制了周代特别是东周历史文化的深入研讨。因此，对东周青铜器作全面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将是今后周代青铜器研究的重点和趋势。东周时期，青铜器数量众多，器类丰富，发展变化大，情况复杂，其中又可进一步划分为春秋青铜器和战国青铜器。对春秋青铜器的分期研究，笔者曾做过些初步的工作，出版了《春秋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一书。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战国青铜器进行分期研究。战国时期青铜器器形仍很复杂，有些甚至超过了春秋时期，如铜鼎、铜豆等。笔者希望通过本书的研究，对战国青铜器复杂的器形进行较为全面深入的整理，并基本建立起战国青铜器的年代学框架。笔者希望通过这样的研究工作，使两周青铜器分期研究不平衡的状况有所改善。

^① 本书所说的青铜器，主要是指青铜容器。

战国青铜器数量众多，是战国时期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其本身的发展变化自成体系，因此，找出其发展演变的规律，使其在学术研究中充分发挥重要作用，是当前最为重要的工作之一。此外，在考古发掘中往往有青铜器伴出，对青铜器的认识关涉到对考古遗存性质和年代等方面的推定，青铜器铭文还提供了许多不见于传世典籍的宝贵史料，在古代史的研究中也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战国青铜器的研究，将为考古学遗址分期的绝对年代及性质的推定、战国史的深入研究等学术领域，提供可靠的依据和素材。

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诸如汉语史、汉语言文字学、档案学等方面的研究也日益广泛地牵涉到古文字和古器物，青铜器分期研究的重要性也将愈益显现出来，其研究成果也将会给各相关学科提供更为准确的年代依据。

有鉴于此，本书定位于战国青铜器年代学的研究，希望能借此将该项工作向前推进一步。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相关研究的历史回顾	1
第二章 关于青铜器年代学研究的方法	9
第三章 战国青铜器的型式	17
第四章 战国青铜器的典型材料和年代序列	72
第五章 战国青铜器的纹饰	116
第六章 战国青铜器铭文释文及说明	145

第一章 相关研究的历史回顾

战国时期七雄争霸，各自为政，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周王室的宗主地位已名存实亡，反映在青铜器上，战国青铜器已具有较为显著的地域特点，但对战国青铜器进行较为全面和专门的分期研究，目前还未见这方面的论著，相关的讨论和成果都包括在整个东周青铜器的研究中。

东周的政治形势与西周相比，一改西周时期王朝一统的局面，诸侯逐渐强大，王室日衰。反映在器物上，从春秋早期开始，东周青铜器逐渐呈现出地域特色，后来研究东周青铜器的学者，为了更好地反映这一客观现象，一般都将东周青铜器按国别或区域进行整理。

郭沫若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撰写的《两周金文辞大系》一书，东周青铜器就是以国别为单位来收录的，但此时尚未涉及到年代学的研究。1941年，容庚先生出版了《商周彝器通考》^①，该书收录近千件商周青铜器，按其器类和年代编排，西周分为前期和后期，东周分为春秋、战国两个阶段，但只有少数器类分别归入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如匜、鬲、兽形尊、盆等，其余只笼统地划归春秋战国时期。

上世纪五十年代，郭宝钧先生出版了《商周青铜器群综合研究》一书^②，书中从考古学的角度出发，以考古发掘资料为主，分商周青铜器为六个界标，东周占三个界标，分别以河南三门峡虢国铜器群为东周早期界标，安徽寿县蔡侯墓铜器群为春秋晚期界标，寿县朱家集楚墓铜器群为战国晚期界标。此外，关于战国青铜器，书中还选取了辉县琉璃阁甲、乙二墓铜器群作为春秋战国之交的代表，辉县琉璃阁 M80、M55 铜器群为战国初期的代表，辉县琉璃阁 M60 铜器群、M1 铜器群分别为战国中期和中晚期之际的代表，辉县琉璃阁 M59、M56、M75 铜器群为战国晚期的补充。此外，书中还举出山西长治分水岭 M14、M26、M12、M25、M53、M35、M36，洛阳中州路 M2729、M2717，唐山贾各庄 M18、M16、

①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哈佛燕京学社 1941 年。

② 郭宝钧：《商周青铜器群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 1981 年。

M5, 山彪镇 M1, 辉县赵固 M1, 邯郸百家村 M57, 邯郸百家村 M3, 山西万荣庙前村, 陕县后川 M2040、M2041、M2048、M2056、M2061、M2144 等墓铜器群作为战国青铜器材料的参考。通观其书, 在年代划分上, 东周时期大别为春秋、战国两个阶段, 每个阶段又分为早、中、晚三期, 每个阶段均有代表性的铜器群, 较之民国时期的研究, 已有突破性的进展。

与西周青铜器相比, 东周青铜器呈现出更多的地域特征, 研究起来比西周青铜器更为复杂, 所以后来许多做东周青铜器分期研究的学者, 又往往以文化特征为主, 分地域进行研究。

在地域的划分上, 学者之间也不尽相同。高明先生认为, 东周青铜礼器, 以产地划分, 大致可分为四个区域, 即: 中原地区、南方地区、北方地区、山东地区^①。台湾学者陈芳妹先生在研究东周青铜盆、簋类器物时, 曾将其分五区进行整理研究, 即西方的秦区, 北方的晋区, 中原的王城区, 东方的齐区, 南方的楚文化区^②。刘彬徽先生认为, 若以青铜敦的器形特征为依据, 分三区即可: 第一区为楚文化区, 第二区为东方齐文化区, 第三区为北方中原文化区^③。朱凤瀚先生以区域特征为依据, 从地域上分战国青铜器为两大类, 即中原地区和中原以外地区。中原地区包括周、三晋和中山, 中原以外地区包括燕、浑源、齐、楚、曾、秦等区域^④。今综合各家意见, 参以笔者的相关研究, 将战国青铜容器按产地大别为四区: 1. 以周晋为中心的北方中原文化区; 2. 南方楚文化区; 3. 东方齐鲁文化区; 4. 西方秦文化区。

学者对以上各区域战国青铜容器的分期研究, 略如下述。

朱凤瀚先生将战国青铜器按地域分为中原地区和中原以外地区已见上文, 其中进一步做分期研究的有三个地区: 中原的周、三晋地区, 南方的楚文化区, 西方的秦文化区, 具体情况如下^⑤。

中原的周、三晋地区共分两期。第一期 of 战国早期, 分为两段。一段属战国早期偏早, 二段属战国早期偏晚。第二期 of 战国中晚期, 也分为两段, 第一段为战国中期偏早到战国中期中叶, 其下限也可能到战国中期偏晚, 第二段当战国中期偏晚到战国晚期。南方的楚国地区共分四期: 第一期 of 战国早期, 分两段。第一段为战国早期偏早, 第二段为战国早期偏晚。第二期 of 战国中期早、中叶, 分

① 高明:《中原地区东周时代青铜礼器研究》(上),《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2期。

② 陈芳妹:《盆、敦与簋——论春秋早中期间青铜染盛器的转变》,《故宫学术季刊》1985年第3期。

③ 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第157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④ 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第十三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⑤ 同上。

两段。第一段为战国中期早叶，第二段为战国中期中叶。第三期为战国中期晚叶到战国晚期偏早。第四期的年代为战国晚期偏晚。西方的秦国地区共分三期：第一期年代为战国早期，第二期为战国早期偏晚到晚期初叶，第三期时属战国晚期，下限可能到秦初。

此外，还有较多的学者是只对某一个地区的战国青铜器进行研究。

一、中原文化区

高明先生曾对中原地区东周青铜器做过系统的研究，他选取了北方中原文化区的 22 座铜器墓，以各墓铜器群为单位，将其分为十组六期。文中并未具体讨论各组相当的年代，只是将其分别归入各历史时期，最后只对各历史时期做了年代估计。各组所包含的墓数、与历史时期的对应关系及具体年代的界定如下^①。

第一期 春秋早期 第一组（共二墓）、第二组（共二墓）（公元前 770—前 650？）

第二期 春秋中期 第三组（共二墓）、第四组（共二墓）（公元前 650—前 550？）

第三期 春秋晚期 第五组（共三墓）、第六组（共三墓）（公元前 550—前 453？）

第四期 战国早期 第七组（共二墓）（公元前 453—前 380？）

第五期 战国中期 第八组（共二墓）、第九组（共二墓）（公元前 380—前 280？）

第六期 战国晚期 第十组（共二墓）（公元前 280—前 221？）

其中四至六期属战国时期，分为早、中、晚三期。年代从公元前 453 年直至秦统一。其中战国中期包括两组铜器墓，年代跨度一百年，是三期中材料最多、时间跨度最长的，似可以第八组和第九组为代表，进一步析为前后两段。

在历史时期的划分上，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学者一般都将东周分为六期，即春秋、战国各分为早、中、晚三期，而将铜器群分别纳入六期的框架。

后来，李学勤先生在详细考察洛阳中州路有关重要墓葬出土青铜器器形、纹饰的基础上，认为中州路东周墓葬的第一、二期均应属春秋中期，其五、六期可以合并，属战国中期，其对应关系如下^②：

第一期 春秋中期偏早

第二期 春秋中期偏晚

第三期 春秋晚期

① 高明：《中原地区东周时代青铜礼器研究》（下），《考古与文物》1981 年第 4 期。

②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第 21—24 页，文物出版社 1984 年。

第四期 战国前期

第五、六期 战国中期

第七期 战国晚期

再加上春秋早期，李先生实将东周时期分为七期，与六期分法不同的是将春秋中期析为早、晚两个阶段，而战国时期仍分为前、中、晚三期。

二、南方楚文化区

楚文化区的东周青铜容器及相关的考古遗迹研究，学者做了不少工作，已取得了许多成绩^①，刘彬徽先生在此基础上，综合已有研究成果，又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整理和研究，他选择了楚文化区 78 座出土青铜容器的墓葬，分为七期，其中春秋时期分为四期，战国时期仍分为早、中、晚三期。其对应关系和具体年代的界定如下^②：

第一期，春秋早期（共三墓）公元前 770—前 670 年 积年 100 年

第二期，春秋中期前段（共五墓）公元前 670—前 600 年 积年 70 年

第三期，春秋中期后段（共十七墓）公元前 600—前 530 年 积年 70 年

第四期，春秋晚期（共十六墓）公元前 530—前 450 年 积年 80 年

第五期，战国早期（共六墓）公元前 450—前 380 年 积年 70 年

第六期，战国中期（共二十墓）公元前 380—前 300 年 积年 80 年

第七期，战国晚期（共十一墓）公元前 300—前 223 年 积年 77 年

每一期中又进一步分为前后两组，共 14 组。

由上所述，在具体的分期方面，目前中原文化区和楚文化区都有六期和七期两种分法。主要的不同在于对春秋中期的看法，前者将其作为一期，后面则将其进一步分为两期，分别为春秋中期前段和春秋中期后段，而对战国时期的看法则比较一致，都分为早、中、晚三期。

三、西方秦文化区

秦文化区，陈平先生做过专门的研究，他在 1984 年发表《试论关中秦墓青铜容器的分期问题》一文^③，文中收录春秋战国秦墓共 33 座，大别为春秋型器群和战国型器群，前者共 17 座墓，分为早、中、晚三期七组。后者共 16 座墓，

① 刘彬徽：《楚国青铜礼器初步研究》，《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5 年；陈振裕：《湖北楚墓综述》，《湖北省考古学会论文选集》，武汉大学学报论丛 1987 年；李零：《论东周时期的楚国典型铜器群》，《古文字研究》第十九辑，中华书局 1992 年。

② 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第 41—55 页，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5 年。

③ 陈平：《试论关中秦墓青铜容器的分期问题》（上、下），《考古与文物》1984 年第 3、4 期。

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四墓为一组，晚期十二墓，分两组。该文分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各为早、中、晚三期，但其特别之处，是铜器的分期与历史时期的分期不完全对应，比如其所划分的春秋型晚期铜器群，其年代实际上相当于战国早、中期，并且各期各组之间或有缺环，此外，其所估计历史时期各期的绝对年代也与其他学者有一定出入，具体情况如下“表一”所示。

表一 关中秦墓青铜容器分期简表

纪元期 (公元前)	历史 时期	器群	期	组	铜器单位名称
770 678	春秋 早期	春秋型 器群	早期	1	宝鸡姜城堡铜器墓、宝鸡西高家 M1
				2	户县宋村 M3、甘肃灵台景家庄 M1
				3	宝鸡福临堡 M1
677 577	春秋 中期		中期		缺环
				4	凤翔八旗屯 AM9、GM2、BM27
				5	传世秦公簋、宝鸡阳平镇秦家沟 M1、M2
576 477	春秋 晚期				缺环
476 385	战国 早期		晚期	6	凤翔高庄 M10
					缺环
				7	沔西客省庄 K202、凤翔高庄 M48、M49、M18 凤翔八旗屯 CM9
384 307	战国 中期	战国 型 铜器	早期	8	大荔朝邑 M107、M203、M103 凤翔八旗屯 M31
306 221	战国 晚期		晚期	9	凤翔高庄野狐沟 M1 宝鸡凤阁岭建河 M 甲、淳化城关战国墓
221 206	秦代			10	凤翔高庄 M33、M16、M17、M47、M46 临潼上焦村 M18、M12、宝鸡凤阁岭建河 M 乙 咸阳塔儿坡铜器窖藏秦代铜器部分

笔者以为，尽管陈先生对铜器群的命名与相应的历史时期有出入，但在历史

时期的划分上，仍将战国时期分为早、中、晚三期，与其他学者的看法一致。

四、山东齐鲁文化区

刘彬徽先生将东周时期山东地区的青铜器分为六期^①，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期：春秋早期（共 5 个单位）

第二期：春秋中期（共 7 个单位）

第三期：春秋晚期（共 7 个单位）

第四期：战国早期（共 2 个单位）

第五期：战国中期（共 5 个单位）

第六期：战国晚期（共 2 个单位）

王恩田先生将东周时期的齐国青铜器分为六期^②，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期：春秋早期（共 4 个单位）

第二期：春秋中期（共 6 个单位）

第三期：春秋晚期（共 1 个单位）

第四期：战国早期（共 5 个单位）

第五期：战国中期（共 7 个单位）

第六期：战国晚期（共 6 个单位）

吴伟华先生对东周时期海岱地区青铜器做过整理研究，文中将战国时期的齐国青铜器分为三期五段：第一期为战国早期，又进一步分为两段，第一段为战国早期偏早，第二段为战国早期偏晚；第二期当战国中期，下限到晚期初叶，进一步分为两段，第一段为战国中期偏早，第二段为战国中期偏晚至晚期初叶；第三期为战国晚期偏早至战国末年^③。

毕经纬先生在对东周时期山东海岱地区青铜容器的研究中，将海岱地区的青铜容器共分为六期，其对应的年代，一至三期以前为春秋时期，第四期约当春秋晚期后段至战国早期，第五期为战国中期，第六期为战国晚期^④。

由上所述，目前做东周青铜器分期研究的学者，战国时期都分为早、中、晚三期，在没有更多新出资料以修正这种看法之前，本书对战国青铜器的分期研究仍用三期分法。

至于各期所相当的绝对年代，目前尚不能准确论定，现姑以刘彬徽先生的意

① 刘彬徽：《山东地区东周青铜器研究》，《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论文集》第 263—269 页，文物出版社 1997 年。

② 王恩田：《东周齐国铜器的分期与年代》，《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论文集》第 282—294 页，文物出版社 1997 年。

③ 吴伟华：《东周时期海岱地区青铜器研究》第 211 页，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12 年。

④ 毕经纬：《海岱地区出土东周铜容器研究》，《考古学报》2012 年第 4 期。

见作为一个大致的参考年代范围，前后容可略有出入。

在以往各家的研究中，涉及到战国铜器型式划分的，有以下一些。

刘彬徽先生在东周时期山东地区青铜器的整理研究中，对鼎、簋、盖豆、敦、簠、铉、壶、鬯等八类常见青铜器进行了型式划分，其中一部分为战国青铜器^①。

王恩田先生对东周时期齐国青铜器中的鼎、铉、敦、鬲、簋、簠、豆、壶、盘、匜等十类做了类型学整理，除鬲、簠因数量少，未作型式划分外，其余八类均划分出了若干型式，所论青铜器一部分时属战国^②。

朱凤瀚先生对战国时期周、三晋地区的鼎、甗、豆、敦、簠、壶、匜、鉴等青铜容器进行了型式划分，在讨论中原以外地区战国铜器的部分，对燕国地区的鼎、壶、豆等几种铜器和秦国地区的青铜明器鼎、甗、壶、盘等做了简要的型式划分^③。

高明先生在对中原地区东周青铜器的研究中，同时也做了型式划分，其中一部分为战国青铜器^④。

吴伟华先生对东周时期山东海岱地区的青铜器进行综合研究，文中用专门的章节，对战国时期山东齐地的鼎、敦、豆、壶、铉、鬯、盘、匜等青铜器进行了型式划分^⑤。

毕经纬先生在对东周时期山东海岱地区青铜容器的研究中，对该地区所见东周时期的鼎、鬲、簋、簠、敦、豆、舟、壶、盘、匜等十类青铜容器进行了类型学整理，划分出了型式，其范围包括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⑥。

本书的研究将充分结合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首先运用类型学的手段对战国青铜容器作型式划分和各型式流行年代的探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战国青铜容器进行年代学研究。此外，本书还参照古文字学的最新研究成果，用专门的章节，对本书所涉及到的考古遗迹中出土的有铭青铜器（包括乐器、兵器等）的铭文进行释文和简要的解释，以便于读者对相关的考古

① 刘彬徽：《山东地区东周青铜器研究》，《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论文集》第269—274页，文物出版社1997年。

② 王恩田：《东周齐国铜器的分期与年代》，《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论文集》第276—282页，文物出版社1997年。

③ 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第十三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④ 高明：《中原地区东周时代青铜礼器研究》（中），《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

⑤ 吴伟华：《东周时期海岱地区青铜器研究》第200—211页，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

⑥ 毕经纬：《海岱地区出土东周铜容器研究》，《考古学报》2012年第4期。

遗迹有一个较为全面深入的理解，充分发挥古文字学在考古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本书希望通过这样的实际工作，不仅能在战国青铜器分期研究的探索上有所贡献，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希望通过这样的实践，使青铜器分期研究的理论方法不断得到总结和提高，以利于今后的学术研究向更深层次发展。

第二章 关于青铜器年代学研究的方法

我们曾指出：“理论方法来源于实际工作，又反过来对实际工作起着指导作用。对任何一门学科来说，理论方法都是至关重要的，没有正确的理论方法，就不可能在实际工作中取得好的成绩。”有鉴于此，笔者在《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一书中，对青铜器年代学研究的方法做了较多的讨论，较为详细地分析了青铜器年代学研究中各种具体方法的作用与局限^①。其中最具争议的当数如何使用铜器铭文中的历日材料，笔者以为，各家推出的西周历谱都互有出入，现今并无可靠的西周历谱，西周历法尚处于探索阶段，因此西周金文所载历日材料，实际上作用有限，只能谨慎地使用。一般说来，排比历日的时间越短越可靠，时间长了，就会因我们不了解西周历法的全貌而出现较大的误差。笔者举出较为典型的五件铜器的历日材料来说明西周历日材料的问题：

1. 静簋：“惟六月初吉，王在京，丁卯，王令静司射学宫……零八月初吉庚寅……”

铭中“丁卯”应在六月初吉之后，既生霸之前，而“庚寅”也应在八月初吉之后不久，但实际上如以丁卯为六月上旬之某一日，则庚寅必在八月下旬。

2. 晋侯苏钟：“唯王卅又三年”，“正月既生霸戊午”，“二月既望癸卯”，“二月既死霸壬寅”。癸卯前既系以既望，则既死霸后不得为壬寅。以“正月既生霸戊午”往后推，与“二月既死霸壬寅”相合，而与“二月既望癸卯”不合，故学者多认为“癸卯”有错。

3. 克钟、克盃：二器为同一人所作。一作于十六年，一作于十八年，而彼此历日不合。前者为“十六年九月初吉庚寅”，后者为“十八年十二月初吉庚寅”，十六年九月庚寅在九月上旬，如十六年至十八年间无闰月，则十八年十二月无庚寅；如有闰月，则十八年十二月庚寅必在十五日以后，与所记“初吉”不合。

4. 元年、三年师兑簋：二器器形纹饰完全相同，应为一时之作，二器铭文

^① 彭裕商：《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第二章，巴蜀书社2003年。

内容也有明显的联系，但在历日上，二器不合。元年器历日为“五月初吉甲寅”，三年器历日为“二月初吉丁亥”，以元年器五月初吉甲寅为五月上旬计算，则三年二月丁亥在十五日以后，与“初吉”不合。

5. 伊簋：器形纹饰属西周晚期后段，纪年为二十七年，铭中提到的右者申季，同是宣王时大克鼎的右者，这些都说明该器年代应属宣王，但其历日“唯王廿又七年正月既望丁亥”却不合现今拟定的宣王历谱，查《中国先秦史历表》，宣王二十七年（公元前 801 年）正月庚申朔，丁亥在二十八日，与“既望”不合。不仅如此，该器历日也不合各家所推算的厉王二十七年的历谱。

以上情况，凡是研究过金文历日的学者都是熟知的。现在又过去了十多年，关于金文历谱和相应的王年，又出现了新的材料，其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两件与西周王年直接相关的器铭。

大家知道，“夏商周断代工程”曾花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对西周历谱进行深入研究，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排出了新的西周历谱。其主要依据有两方面，一是《武成》、《召诰》、《毕命》等传世文献中的相关历日材料，二是年、月、月相、日干支四要素俱全的金文历日材料。其所排新的西周历谱中，西周各王王年如下。

“夏商周断代工程”西周金文历谱王年

	在位时段（公元前）	在位年数
武王	1046—1043	4
成王	1042—1021	22
康王	1020—996	25
昭王	995—977	19
穆王	976—922	55（共王当年改元）
共王	922—900	23
懿王	899—892	8
孝王	891—886	6
夷王	885—878	8
厉王	877—841	37（共和当年改元）
共和	841—828	14
宣王	827—782	46
幽王	781—771	11

然近年公布的两件铜器其纪年与此不合，一件是觉公簋，一件是峻簋，先说前者。

觉公簋纪年为二十八年，有铭文四行 22 字，抄录于下：

觉公作妻姚

簋。邁于王命

唐伯侯于晋，

唯王廿又八祀。

铭中并未明言“廿又八祀”属西周何王，关于该器年代，主要有以下一些意见。

朱凤瀚先生指出，觉公簋器形纹饰接近商末的絳簋和甘肃灵台白草坡 M1：8（按：应为 M1：10），其年代当彼此接近，再结合铭文字形特点，认为此器当不晚于西周早期中段，铭中所言“唯王廿又八祀”的王只能在成王、康王中选择。他分析了成王和康王的两种可能性，文中并未作出明确的结论，但从行文来看，似较倾向于铭文纪年为成王廿八年，因为这样才不晚于西周早期中段^①。

李学勤先生举出了一些与觉公簋相近的器物，有山西洪赵永凝东堡的簋，晋侯 M113：59，天马一曲村 M6127 簋、M7161 簋，甘肃灵台白草坡 M1：10，陕西宝鸡竹园沟 M3 簋，洛阳北窑 M37 的伯懋父簋等，认为这些器物或出这些器物的遗迹年代大都在西周早中际，再结合一些相关文献，认为该器当定为康王时期。

此外，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第 164 期《简报》的研讨会纪要，张永山先生认为，该器置于成王，也许和一些文献结合得更好些；王世民先生以器形、纹饰为主，认为该器置于康王显得稍晚。其他的专家则主要是针对怎样将觉公簋纳入到“断代工程”的历谱框架中发表意见，对该器的器形、纹饰和铭文特点较少讨论。

大家知道，器形、纹饰和铭文，是推断青铜器年代的主要因素，故笔者着重就这方面进行考察，看觉公簋放在什么时段比较合适。

在讨论之前，笔者先就青铜器器形、纹饰的比较略陈浅见，供大家参考。

笔者以为，器形、纹饰的比较应当有一个层次方面的划分。

器形方面，西周铜簋的主要形态是器腹和圈足，一般有双鋉耳，共三部分。三部分在往后都有所变化，但三者的变化有早有迟，不会同时发生。所以，三部分形制完全相同，为第一层次。两者相同，为第二层次，只有一部分相同，为第三层次。在西周早期，三者中具有年代意义的主要是腹部和圈足，故讨论中本文以腹部和圈足的变化为主，鋉耳只作为次要的辅助条件。

纹饰方面，某一时期同时并存有许多不同的纹样，这些纹样在往后的发展中当不断有所变化，直至被淘汰。但与簋形器的器形演变一样，同时流行的各种纹

① 朱凤瀚：《颯公簋与唐伯侯于晋》，《考古》2007 年第 3 期。